

# 侯汝華與香港文學的結緣

## ——兼論香港文學如何抵抗遺忘

葉 倬 璋\*

### 提 要

侯汝華在中國現代文學論著裏，只是一個不被注意的名字，作為李金髮的學習者、及現代派青年詩人群中的一員。香港學者回顧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香港詩壇，發現了侯汝華的活躍，又熱切提高他的文學地位，即使其香港作家的身分後來受到質疑。本文主要處理兩個問題：一是以《紅豆》為代表的香港文壇對侯汝華詩風轉變及廁身現代派重要詩人隊列的作用；二是香港學者對侯汝華身分被質疑的回應，引伸出來對於香港文學主體性的迷思。本文認為，香港學者熱衷於侯汝華研究，顯示出對香港文學被遺忘的焦慮，他們採用的各種論述策略，乃在於抵抗遺忘。侯汝華能否成為不能繞過的作家，固然為論者關注；然他們心之所繫的，更是香港文學的主體性及意義會否被遺忘。

**關鍵詞：**侯汝華、香港文學、現代派、抵抗遺忘、紅豆

---

本文於 108.12.05 收稿，109.06.17 審查通過。

\*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2006\_(69).0005

# The Bonding of Hau Ruhua and Hong Kong Literature: Further Discuss How Hong Kong Literature Resists the Oblivion

Yip, Cheuk-Wai\*

## Abstract

As a neglected literati among the discours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u Ruhua is simply considered a follower of Li Jinfa and one of the young modernist poets. Reviewing the poetry world in Hong Kong in the 1930s, many Hong Kong scholars unveil the activity of Hau Ruhua and manage to promote him to a higher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despite his reputation as a Hong Kong writer is being jeopardized afterward. There are two major focuses of this article: 1) the impact that, starting from poetry magazines, such as *Red Bean*, the Hong Kong literary world made on the changes of poetry style of Hau Ruhua and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Hau Ruhua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modernist poets; 2) the sophistic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led by the response to the doubt about Hau Ruhua's identity. I suggest that the enthusiasm of Hong Kong scholars for the Hau Ruhua study project indicates the anxiety of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being neglected. Various discursive strategies are applied in order to resist the oblivion. Although many scholars focus on whether Hau Ruhua is an unignorable writer, the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jor concern of them actually is whether the subjectivity and the meaning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are being neglected.

***Keywords:* Hau Ruhua, Hong Kong literature, modernist, resist oblivion,  
*Red Bean***



# 侯汝華與香港文學的結緣

——兼論香港文學如何抵抗遺忘\*

葉 倬 璋

## 一、引 言

侯汝華（1910-1938），梅縣人，活躍於三十年代的香港文藝雜誌，曾一度被認為是香港詩人；他的生平資料非常匱乏，幾部香港文學史著述及早期香港新詩史，提及他時都非常簡要。<sup>1</sup>然而，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中聲名不彰，大多數情況在介紹象徵派和現代派的詩人群時，會列寫他的名字，但甚少

---

\* 本文初稿曾在2019年7月「香港文學與文化研究研習坊」宣讀，得到黃美娥教授、張俐璇教授指正。撰寫過程中，陳國球教授、陳智德博士和區仲桃博士亦曾予寶貴意見，博士生張歡歡女士在文獻校訂方面出力甚多。至於兩位匿名審稿專家的專業意見，更是本文能成功出刊的關鍵。謹此致謝。

<sup>1</sup>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述說早期的文藝雜誌時，指香港和廣州一批青年作者是主要撰稿人，名單上有侯汝華；然後舉例說明這些詩人的作品特點，也曾以侯汝華〈黎明〉為例，指他們「以氣氛隱喻來創造詩的形象」。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21、25。潘亞暉、汪義生《香港文學史》「香港新文學的發軔（1920-1936）」有述侯汝華詩歌特點約三百字，指其詩帶有象徵主義色彩。潘亞暉、汪義生：《香港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年），頁53。劉登翰《香港文學史》介紹早期香港新文學作家時，提到侯汝華，但沒有分析。劉登翰：《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頁77、79。施建偉等著《香港文學簡史》只在介紹早期新詩部分，述及當時的新詩屬探索階段，但已湧現了以李育中、侶倫、隱郎、侯汝華等為代表的青年詩群。施建偉、應宇力、汪義生：《香港文學簡史》（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8。以上幾部著述都是中國內地學者執筆的，只有潘亞暉曾居香港，他是福建人，四十年代曾到香港華僑工商學院文史系就讀，廣州暨南大學退休後遷居港至2014年離世。

細論，故有論者認為他是「無名詩人」。<sup>2</sup>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侯汝華的研究，幾乎都不離開香港文學，研究侯汝華的也大多是香港作家及學者，「侯汝華為早期香港詩人」幾屬常識。<sup>3</sup> 2009年，早期香港文學見證人李育中（1911-2013），在百歲壽宴後跟後學談論關於香港文壇的記憶，突然說「侯汝華都沒來過香港，為何稱之為香港作家」。這一句話震撼了不少香港文學研究者，<sup>4</sup>

<sup>2</sup> 葉輝介紹三十年代七位「無名詩人」，侯汝華即為其一。葉輝：〈三〇年代的「無名詩人」〉，《文學世紀》第2卷第1期（2002年1月），頁53-54。崑南說侯汝華是「被遺忘的南國詩人」，崑南：〈編後話：詩的盛宴〉，《詩潮》第1期（2002年2月），頁78。現代文學史著述對侯汝華著墨很少，孫玉石在不同的新詩研究中提到侯氏，認為他受李金髮影響，但皆未有展開論述。如氏著：《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頁149，又氏著：《中國現代詩歌及其他》（臺北：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66。舒蘭《中國新詩史話》對新詩的流派、社團、詩人作條列說明，但僅在「『現代』詩人」一條列舉現代派詩人時包括侯汝華的名字。舒蘭：《中國新詩史話》（臺北：渤海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頁650。朱光燦《中國現代詩歌史》分述現代派詩人時，有簡要舉例說明侯汝華的詩風特點。朱光燦：《中國現代詩歌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617-619。

<sup>3</sup> 胡從經《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收錄侯汝華詩集《海上謠》。胡從經：《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香港：朝花出版社，1998年），頁88-89。陳智德編《香港三四〇年代香港新詩論集》收李金髮〈序侯汝華的「單峯駝」〉，陳智德編：《香港三四〇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4年），頁112。關夢南、葉輝主編《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上冊介紹文藝期刊時有列出侯汝華作品，下冊集錄三十年代詩集部分，有收侯汝華《海上謠》，小註交代資料來自胡從經《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關夢南、葉輝主編：《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香港：風雅出版社，2006年），上、下冊。

<sup>4</sup> 李育中在1999年到香港參加研討會時，已提到侯汝華是《紅豆》的詩歌供稿者，但並未談到侯的香港作家身分問題。李育中：〈我與香港——說說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黃維樑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32。2009年，黃仲鳴參加了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為李育中舉辦的百歲慶生活動，於《文匯報》副刊發表了〈李育中〉文章，憶述了李育中關於侯汝華的香港作家身份的話。黃仲鳴：〈李育中〉，載《文匯報》副刊采風版（2009年12月19日）。

侯汝華的香港作家身分被顛覆了，<sup>5</sup>《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新詩卷》也沒有選入侯汝華，侯汝華似要告別香港文學。然而，香港學者雖然審慎處理侯汝華的身分，但仍然是研究侯的中堅分子，甚至第一部侯氏詩文的結集，也是由香港學者編纂、香港出版社於2018年出版。<sup>6</sup>侯汝華在中國內地所受到的關注，遠不如在香港，要麼被遺忘、要麼依循已有的香港文學研究框架進行羅列或說明。<sup>7</sup>

<sup>5</sup> 吳心海：〈沒有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象徵派詩人侯汝華生平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3期，頁103-105。

<sup>6</sup> 侯汝華身份爭議出現後，發表侯汝華研究的香港學者有關夢南：《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香港：風雅出版社，2012年）、朱少璋：《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香港：滙智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是迄今唯一一部今人整理的侯汝華詩文集、氏著：〈不能繞過的作家——侯汝華〉，載《明報》明藝版（2017年12月25日）、2018年1月，朱少璋亦以同題在香港演講，又氏著：〈《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的「據本」意義〉，《聲韻詩刊》總41期（2018年5月），頁52-53、劉偉成：〈水手與腔棘——談侯汝華詩之「不能繞過」〉，《聲韻詩刊》總41期（2018年5月），頁42-52。

<sup>7</sup> 例如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王瑤在清華大學的「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材，於五十年代初出版，當中將新月派和現代派同列一節，談及陳夢家、卞之琳、施蛰存、戴望舒、林庚等人的主張及新詩。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重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上冊，頁222-227。廣為中國內地高校使用的現代文學教材，錢理群、溫儒敏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在第二個十年（1928-1937）有述現代派一節，說明了戴望舒、卞之琳、施蛰存、徐遲、廢名、林庚等現代派詩人的詩歌特點，年表也有列入諸人的詩集，但並沒有述及侯汝華。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361-373。1990年在中國內地出版的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稱侯為香港青年作者，說「他是從寫古老的意象和情緒轉向現代派的」；王劍叢《香港文學史》沒有談侯汝華，但有提林英強、路易士等人。施建偉等《香港文學簡史》則稱侯汝華為香港三十年代青年詩群的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趙稀方近年發表多種關於《紅豆》的文章，其中也涉及侯汝華。他認為侯汝華是受李金髮影響的香港「半唐番體」詩人，而李金髮是香港這種特殊詩體的起點。趙稀方：〈中國現代詩的「飛地」——被遺忘的香港《紅豆》現代詩群〉，《北方論叢》2016年第2期，頁1-7。此文後來稍加修訂，成為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的一章。見氏著：《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香港：三聯書店，2019年），頁115-116。

為何侯汝華跟香港文學結下不解緣？侯汝華從未自稱香港作家，作品內容也幾乎不涉香港，<sup>8</sup>他生活在現代文學急速發展之時，大概想像不到半世紀以後會有研究者將他歸入香港文學範疇。本文審視這些材料，認為作家研究並不是研究者的唯一目的；他們關切的是香港文學的本質、範圍，這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大敘述影響焦慮的反應。侯汝華研究遭受的質疑，也同樣是追問香港文學本土性時遇到的挑戰。

一個詩人，一個地方，在研究者的筆下構建出難以割捨的連繫。細考侯汝華詩歌道路上的足跡變化，及侯氏如何被研究、被表述，將對侯汝華及香港文學二者的同命關係和學術意義有更深入的認識；從而知道，這不僅是一個作家研究的個案，更有著牽繫著香港文學如何反觀自身主體性的重要性。

## 二、侯汝華——現代派明日之星

侯汝華是廣東梅縣人，曾在梅縣私立中學就讀，後任教師；可考的行跡包括有梅縣、汕頭、廣州及南京，暫時未發現曾到香港的直接證據。<sup>9</sup>現在找到他最早發表的作品是1928年《婦女雜誌》上的短篇小說〈秋菊〉，1932年以

<sup>8</sup> 朱少璋發現侯汝華散文〈夢的進行曲〉有香港皇后大道的描述。朱少璋：〈不能繞過的作家——代序〉，《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viii。該文除了皇后大道，也有港灣、南方的島國、海傍市、過海的小汽船等描述，文章主人翁是一個移居島國的「他」。但始終未有直接證據證明侯氏到過香港。該文原刊於《六藝》創刊號（1936年2月），頁44-45。亦見朱少璋：《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頁296-299。

<sup>9</sup> 關於侯汝華行跡的研究，可參陳智德〈論侯汝華〉，《詩潮》第1期（2002年2月，頁65-67），吳心海〈沒有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象徵派詩人侯汝華生平考〉，朱少璋〈不能繞過的作家——代序〉等。據《梅縣私立東山中學二十周年紀念錄》，「新制初中第一屆（民國十五年夏）」學生名單有侯汝華、林英強。同刊亦有「本校廿年間校友姓名藉屬調查表」，「東廂堡」有侯汝華。東山中學廿周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梅縣私立東山中學二十周年紀念錄》（梅縣：東山中學校，1934年），頁133、140。

前的發表作品都是散文和小說，然後才開始大量發表詩歌，詩作刊於《現代》、《橄欖月刊》、《婦人畫報》、《紅豆》、《新詩》、《小雅》、《詩經》等。當代學者陳述三十年代的新詩詩壇時，多將侯汝華歸入「現代派」，及受李金髮影響的青年詩人；<sup>10</sup> 倘若細考侯氏的詩歌創作道路，當能對這評斷有更精準的說明，特別在侯汝華是否、如何成為現代派的重要詩人的問題上。

李金髮替侯汝華寫詩序時是 1933 年，其時侯汝華剛發表新詩不久；同時，李氏也替侯的好友林英強寫詩序。<sup>11</sup> 已成名的李金髮稱侯、林為少年詩人，讚賞二人的詩歌。他指侯汝華的詩「全充滿我的氣息」、「幾以為是自己的詩句」，<sup>12</sup> 成為後來評論者指侯為李追隨者的「權威認證」。侯汝華早期的詩，富象徵意味，確實看到師法李金髮的痕跡，如 1933 年刊於《現代》的〈傍晚〉：

黃昏如可怕的棺。  
掠空而過的啼鴉，  
馱負著蒲公英的  
傷情的詩句。  
欲墜的夕陽，  
像埃及帝王墓中之小船；

<sup>10</sup> 張振金比較詳細地描述了侯汝華的詩風和歸屬，他認為林英強、柳木下、侯汝華等人早在學生時代，就受到了李金髮象徵派詩的熏陶，後來加入了戴望舒為代表的現代派詩潮，侯更是現代派中「活潑的小伙計」。張氏指侯汝華詩多自嘆生活的困苦和身世的淒涼，也有一些詩寫得開朗、清新、健康，能給人以美的感受，或從側面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苦難，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在詩的技巧方面，張氏認為侯汝華不少詩是晦澀難解的，但他極力使用新鮮的比喻，捕捉奇特的觀念聯絡，表現新異的詩情詩意，給讀者一種新的感受。張振金：《嶺南現代文學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141、143-146。

<sup>11</sup> 李金髮：〈序林英強的「淒涼之街」〉，《橄欖月刊》第 35 期（1933 年 8 月），頁 13-14。

<sup>12</sup> 李金髮：〈序侯汝華的「單峯駝」〉，《橄欖月刊》第 35 期（1933 年 8 月），頁 12-13。

我以鄭重的囑咐，

托彼載幽嘆以西去。<sup>13</sup>

詩中詭異意象滿目，文白句法雜陳。以厚重的棺喻黃昏，啼鴉隨夕陽西去，構築成神秘而蒼涼的畫面，有如馬致遠〈天淨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蒲公英和小船的輕，已無法將消逝之夕照逆轉。侯汝華早期的詩有明顯的象徵主義特點，李金髮序文指侯「儘可追認為象徵派」，隱郎撰於1934年的〈論象徵主義詩歌〉一文，援引施蛰存、禾金等人刊於《現代》的詩歌，論證象徵派的詩歌特點，便羅列了包括侯汝華在內的詩人，指他們「多少總染有象徵主義的色彩的」，也可證侯汝華在當時的歸屬。<sup>14</sup>

固然，侯汝華屬於「現代」詩人群裏一員，但他在1933-1935年間並沒有成為「現代派」的代表詩人，只能說是「現代派」的明日之星。施蛰存辦《現代》雜誌時，多提拔年青詩人，他曾讚許侯汝華的詩，並在《現代》上刊登了侯的三首詩。<sup>15</sup>若以刊詩數量看，侯氏並不算曝光度最高的一批詩人，遠不及施蛰存、金克木、路易士、林庚、戴望舒及徐遲等人。1935年，孫作雲撰寫了〈論現代派詩〉，其中論及十位詩人，包括戴望舒、施蛰存、李金髮、峨珈、何其芳、艾青、金克木、陳江帆、李心若、玲君，可以概知當時對「現代派」代表

<sup>13</sup> 此詩原載《現代》第4卷第2期（1933年，頁318），乃侯汝華在該刊發表的第三首詩。其他兩首分別是〈迷人的夜〉，見於第2卷第4期（1933年，頁545-547）及〈單峯駝〉，見於第3卷第2期（1933年，頁209-210）。朱少璋《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誤記為《紅豆月刊》第4卷第2期（1936年）。考《紅豆》該期確有侯汝華詩〈傍晚〉及〈湖〉兩首，但〈傍晚〉與本詩只是同題。朱少璋：《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頁179。

<sup>14</sup> 隱郎：〈論象徵主義詩歌〉，《今日詩歌》九月始創號（1934年9月），頁13。

<sup>15</sup> 施蛰存於1932年12月15日的日記曾有以下文字：「披閱外來投稿，小說方面沒有什麼動人眼目的作品。倒是詩及散文卻頗有值得選留者。抄錄陳琴、侯汝華、龔樹揆詩各一首，略為竄削，付排。」沈建中編：《施蛰存先生編年事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上冊，頁197。

詩人的認知，而侯汝華就不在此列。<sup>16</sup> 按現有的文獻，侯汝華在該時期發表約 60 首詩歌，其中 18 首刊於南京的《橄欖月刊》，其他散見上海、廣州等地的文藝雜誌；換言之，《現代》也不是侯汝華的主要刊詩平台。他跟「現代派」詩人同刊作品，除了 1933 年於《現代》，就要等到 1935 年的《現代詩風》。戴望舒從法國回上海，與施蛰存一起組織「現代派」詩人，辦了一期《現代詩風》，侯汝華也在此刊詩三首。<sup>17</sup> 編列次序排在玲君、金克木、徐霞村、施蛰存、戴望舒、徐遲、南星（即杜南星，1910-1996）之後，林庚、路易士之前。1934 年年底，劉火子撰文批評「現代派」詩脫離人民生活，「祇是從個人的見地去理解，而不從社會學的見地去理解」，只著重「作人道主義的無謂的吁嘆」，無力於深刻批判現實。文中組合了二十首《現代》雜誌上的詩歌，說明「現代派」作品如何局限於狹隘的小市民階層現代生活，其中包括侯汝華〈迷人的夜〉。<sup>18</sup> 以上的材料，說明了侯汝華自進入詩壇後至 1935 年，在「現代派」的位置，他是詩人群中一員，但並不屬於中堅分子，也未受到很大關注。

吳奔星 1936 年 6 月於北平編《小雅》，共出六期（實五本，第 5、6 期合刊），其中三期刊侯汝華的詩，共六首。同年 10 月，戴望舒等人主編《新詩》，總共十期（第 2 卷第 3、4 期合刊），其中五期共刊 12 首侯汝華詩歌。韓北屏於同年 11 月編《詩志》，僅三期，三期都有刊侯汝華詩，共 4 首。這三部詩刊曾被紀弦譽為當時的「三大詩刊」，乃「現代派」研究的重要文獻。侯汝華在三部詩刊的高曝光，可見他在「現代派」的位置爬升。而後來鷗外鷗撰文批判戴望舒及現代派詩人，羅列「現代派」的詩題：

<sup>16</sup> 孫作雲：〈論現代派詩〉，《清華週刊》第 43 卷第 1 期（1935 年），頁 60。

<sup>17</sup> 包括〈水手〉、〈海上謠〉、〈窗〉，見《現代詩風》第 1 期（1935 年 10 月），頁 28-30。關於《現代詩風》的籌辦和格局，可參王宇平：《漩渦裏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代派」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陳子善先生指導，2009 年），頁 175。

<sup>18</sup> 文章標示撰寫日期為 1934 年 12 月 20 日。劉火子：〈論「現代」詩〉，《南華早報·勁草》（1935 年 1 月 18-21、23、26-27 日）。本文所引轉引自陳國球編：《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340-360。

蔭路，守墓人，智井，簷溜，淚，水，巡遊人，當爐女，無題，海上謠，  
樂園鳥，脫襪吟，有遇，晨興，古意，答客問，神誥。

他批評現代派詩人根本不能表現「現代的情緒」，只算得上是象徵派。<sup>19</sup>「海上謠」是侯汝華刊於《現代詩風》的名作，這題目也只有侯氏寫過。四十年代，聞一多《現代詩抄》和孫望《戰前中國新詩選》，都選入了侯汝華的詩歌。<sup>20</sup>侯汝華在「現代派」及中國現代詩史中該佔什麼位置，自然由後來文學史家論斷；但考察他在當時詩壇的活躍程度和接受情況，可以得知他自1936年年中開始已走入「現代派」的重要詩人隊列。

《現代》於1935年5月停刊，接續出版的《現代詩風》僅出一期亦無以為繼；直至《小雅》、《新詩》面世前，有近一年時間「現代派」詩人在中國內地並無固定發表平台。惟於這短短一年間，為何侯汝華在「現代派」的地位卻大有改變呢？侯汝華跟香港文學的結緣將予這問題一個值得玩味的答案。

### 三、誰曳流星尾巴：侯汝華與香港文學的結緣

李育中以見證人角色否定侯汝華「香港作家」的身分。侯汝華是否屬於「香港作家」，可以是文學史研究者問的問題，但不應是邏輯上限制後續問題的前設。也就是說，即使侯汝華也許沒有在香港居住過、不是「香港作家」，也不應就此剝奪以香港文學的框架討論侯汝華的權利。當我們審視侯汝華跟香港文學的關係後，就會發現一方面侯汝華的文學地位有賴香港文學賦予，一方面在

<sup>19</sup> 鷗外鷗：〈搬戴望舒們進殮房〉，《廣州詩壇》1937年第3期，頁18。

<sup>20</sup> 聞一多《現代詩抄》選入侯汝華〈水手〉，據《現代詩風》本，及〈燈與影〉，據《新詩》新4期抄入。孫黨伯編：《聞一多全集·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483-484。孫望《戰前中國新詩選》編成於1944年，選侯汝華〈老年人〉，據《新詩》第1卷第1期。孫望：《戰前中國新詩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8。陳智德研究侯汝華詩被編入選集時，描述了這兩部詩選的產生背景。陳智德：〈論侯汝華〉，頁65-67。

追跡侯汝華同時也在追問香港文學的本質。本節將論述前者，後一個問題會在下一節探討。

就現有文獻所見，侯汝華詩歌首次見於香港文藝雜誌，應是 1934 年 9 月由火子、隱郎編的《今日詩歌》上的〈良辰〉；<sup>21</sup> 然後是次年 1 月由易椿年、侶倫《時代風景》上刊載的〈妄念〉。<sup>22</sup> 兩種雜誌都僅見一期，較難以之評估侯汝華的地位。至於被學界認為在三十年代香港最重要的文藝期刊《紅豆》，她對提高侯汝華的文學地位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紅豆》自 1933 年 12 月創刊，至 1936 年 8 月停刊，一共出版了四卷二十四期，是三十年代最長壽的香港文藝期刊。雜誌經理梁之盤曾到廣州中山大學旁聽，結識張寶樹教授（J.D. Bush），和陳江帆、李心若等現代派詩人。自《現代》於 1935 年 5 月停刊，現代派詩人成為《紅豆》的主要供稿者；到《紅豆》停刊，他們才回歸到內地主編的《小雅》《新詩》《詩志》等雜誌。學者曾以「飛地」比喻《紅豆》對現代派詩人群的作用，亦有論者指《紅豆》一方面成為現代派的臨時文藝陣地，一方面現代派亦壯大了《紅豆》自身的實力，使之具備轉向純文藝刊物的發展條件。<sup>23</sup> 侯汝華在《紅豆》刊詩正是 1935 年 7 月至 1936 年 7 月這段夾縫時間，雖僅一年，但以下幾點事實卻能證明《紅豆》如何重視侯汝華：

首先，十期中有八期刊載侯汝華作品，共刊詩 18 首及小說 1 篇，其中七期都以侯氏詩歌作詩頁之首篇刊登，可見《紅豆》對侯汝華的重視。如上所述，侯汝華在此之前並不算是現代派的中堅作者，《紅豆》刊登的現代派詩作也不限於侯汝華，還包括李心若、陳江帆、路易士、林庚、吳奔星等人。眾人在現

<sup>21</sup> 《今日詩歌》依次收倫冠、杜格靈、李育中、隱郎、侯汝華、火子、林英強、易椿年、張弓、巴度、Jim Water、陳鴻的詩歌。

<sup>22</sup> 《時代風景》依次收侯汝華、鷗外鷗、李心若、吳天籟、張任濤、李堅磨、林英強的詩歌。

<sup>23</sup> 趙稀方：〈中國現代詩的「飛地」——被遺忘的香港《紅豆》現代詩群〉，頁 1-7。葉倬璋：〈在兩道夾縫中綻放——《紅豆》編輯格局探析〉，《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 3 期（2018 年 8 月），頁 61-93。

代派名聲都不下於侯，但《紅豆》卻有七次之多以侯詩置於首篇，對侯氏不可不謂青眼有加。另外，《紅豆》編輯路向曾經過調整，由綜合文藝雜誌轉向純文藝雜誌，侯汝華活躍於後者。學界曾注意《紅豆》出版過幾次專號，<sup>24</sup> 包括「世界史詩專號」（第2卷第3期）、「英國文壇十傑專號」（第3卷第1期）、「吉伯西專號」（第3卷第4期）、「詩專號」（第4卷第1期），及停刊前一期宣言之「詩與散文月刊之始」（第4卷第5期），最後三次專號都有刊侯氏的詩，並且兩次以首篇姿態出現，都可證侯氏的活躍及重要。侯汝華在這一年刊詩五十多首，竟有18首刊在《紅豆》。故此，侯汝華乃《紅豆》的主力詩人，而《紅豆》亦係侯汝華的主要刊詩平台。

其次，《紅豆》自第3卷第1期起由上海生活書店經銷，第2期開始刊登詩文集廣告，代表《紅豆》進軍內地文藝銷售市場。<sup>25</sup> 這些詩文集廣告偏重於現代派詩集，如路易士《行過之生命》、林庚《夜》及《春野與窗》、蔣有林《青色的戀》、吳奔星《暮靄》等，侯汝華《海上謠》的廣告也出現過三次。

<sup>24</sup> 袁勇麟較早注意到《紅豆》的專號對譯介西洋文學的貢獻，袁勇麟：〈20世紀香港新詩與外國文學關係淺探〉，《海南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頁85。鄭政恆討論「電影清潔運動」時，大量運用《紅豆》「電影清潔運動特輯」的文章，鄭政恆：〈教育、藝術、娛樂、商業？——第一次電影清潔運動的史料發掘與闡述〉，《文學評論》第15期（2011年8月），頁86-89。楊國雄介紹過這幾個專號，楊國雄：《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287-289。陳國球留意到《紅豆》幾輯專號有英美文學氣息，及經理梁之盤可能受到張寶樹的影響。陳國球：〈南國西潮——香港早期文學評論與境外文學思潮〉，《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108-110。葉倬璋析《紅豆》編輯格局，也指出過《紅豆》幾個專號對承傳五四傳統的自覺。葉倬璋：〈在兩道夾縫中綻放——《紅豆》編輯格局探析〉，頁67-68。

<sup>25</sup> 趙稀方指《紅豆》由上海生活書店經銷，「這意味著它與國內文壇關係的加深」，趙稀方：〈中國現代詩的「飛地」——被遺忘的香港《紅豆》現代詩群〉，頁2。



圖：《紅豆》上刊登的侯汝華詩集廣告

這段時間可說是侯汝華的收成期。1933年，李金髮雖曾序侯汝華的《單峯駝》，但此集是否已出版則未可知。<sup>26</sup>但《海上謠》於1936年4月出版卻可看到侯汝華於文壇頗受重視的事實。該詩集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發行，這家出版社於1934年由邵洵美（1906-1968）和張光宇（1900-1965）創立，張光宇是當時的著名漫畫家，上海時代圖書公司1936年出版之「新詩庫」第一集的封面便全由張氏操刀設計，侯汝華《海上謠》便是此集九種書的其中第八種，其他八種分別是方瑋德（1908-1935）《瑋德詩文集》、梁宗岱（1903-1983）譯《一切的封頂》、陳夢家（1911-1966）《夢家存詩》、金克木（1912-2000）《蝙蝠集》、邵洵美（1906-1968）《詩二十五首》、朱湘（1904-1933）《永言集》、羅念生（1904-1990）《龍涎》、徐遲（1914-1996）《二十歲人》。「新詩庫」

<sup>26</sup> 部分論著述記侯汝華時也將《單峯駝》列入其著作，侯有〈單峯駝〉詩，但筆者並未找到《海上謠》以外的侯汝華詩集，《民國時期總書目》亦未收此書，只收錄《海上謠》。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文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上冊，頁380。著述所依的估計是李金髮的詩序，未必見過實體詩集。

由邵洵美主編，出版時方瑋德和朱湘已經過世，但九種詩集著者都是年青而有獨特風格的詩人，<sup>27</sup> 邵洵美主辦這套書，也有著鼓勵新詩人，希望以系統方式出版的想法。現在限於文獻，較難還原「新詩庫」的出版緣起；但從文學史回顧的角度看這批作者，他們都是足以在文學史、文化史、學術史留名的人，<sup>28</sup> 配合當時的語境，「新詩庫」可說是具眼光的精品選集，值得學界重視。張光宇繪製的《海上謠》封面，以鏡像拼砌出海與天、黑與白的對照空間，由瞭望鏡、水管或者隧道作為進入空間的媒介，頗有心象世界的設喻。這部詩集於上海出版、在《紅豆》上推廣，是滬港讀者都能讀到的詩集，胡從經編《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也有收錄此書，這部書是文學史著述介紹侯汝華時必然提及的詩集，然這也很可能是侯氏留下的唯一詩集。



圖：張光宇設計的侯汝華《海上謠》封面

<sup>27</sup> 倪墨炎對「新詩庫」九種書有過簡略介紹。倪墨炎：〈邵洵美的事業也有其輝煌的時期（下）——出版《新詩庫》和《自傳叢書》〉，《博覽群書》1999年第10期，頁30-31。

<sup>28</sup> 方瑋德、朱湘和陳夢家是新月派作者，梁宗岱是重要的文藝論者及翻譯家，金克木和徐遲是現代派的中堅作者，羅念生是希臘文學翻譯家及學者。

侯汝華在香港受到關注，不能滿足於出版狀況的說明；侯汝華這時也正是詩風轉型的時期。早期對侯汝華詩的討論比較簡單，大多依循李金髮的論調，概述其早期詩的象徵特點。香港學者陳智德最早指出侯汝華詩風曾有過由象徵到現代的轉型，「保留一點象徵派的暗示手法，以意象呈現代替自我表白式的濫情」；<sup>29</sup> 後來另一位香港學者劉偉成亦贊同此說，又指侯汝華「用平淡語句擺脫李金髮的影響焦慮，以心底情感發展詩的音樂性」。<sup>30</sup> 這些討論都論證了侯汝華後期的詩歌較具個性，脫出了李金髮的影子，而這又正是侯氏大量在《紅豆》刊詩的時期。

1935年下半年，侯汝華有意識地宣傳自己的創作態度。汪迪民在《文藝大路》上辦了一輯「我的創作態度」徵文，趙景深、洪為法、任白濤、李金髮、吳奔星及侯汝華等人響應投稿。侯汝華的文章表示反對用「術」製造出來的作品，認為這是「用淺薄的想像去描寫自己沒有的經驗」，是「投機的創作」。他亦贊同郁達夫「一切創作都是作者的自敘傳」說法。<sup>31</sup> 侯汝華的說法不算有新意，但問題在於他一方面批評作者想像一些自己沒有的經驗去「投機的創作」，一方面他又寫水手、少女、蛋女、女侍、盲樂女……這都是侯汝華自己沒有的經驗，那不是自相矛盾嗎？數月以後，《海濱文藝》上刊出了沈達材一封予侯汝華的覆信。侯致沈的信已看不到（或者根本不存在），但沈之覆信主要談論侯氏詩，當可用以觀察侯氏寫詩的態度及藝術追求。沈氏曾任教海濱師

<sup>29</sup> 陳智德：〈論侯汝華〉，頁 66。

<sup>30</sup> 劉偉成：〈水手與腔棘——談侯汝華詩之「不能繞過」〉，頁 46-47。劉偉成認為侯汝華詩的意象跟法國象徵派瓦雷里（Paul Valéry）相當接近，並作了比較研究。劉氏認為雖然梁宗岱和曹葆華在 1935 年翻譯過瓦雷里的詩論，但他相信侯汝華沒有怎麼讀過瓦雷里的詩。筆者翻檢文獻，發現侯汝華在散文〈西湖小品：黎明〉提過侯在〈黎明〉提過「保爾·哇奈荔」，即瓦雷里。侯汝華：〈西湖小品：黎明〉，《文藝大路》第 1 卷第 6 期（1935 年 10 月），頁 245。

<sup>31</sup> 侯汝華：〈一切創作都是作者的自敘傳〉，《文藝大路》第 2 卷第 1 期（1935 年 11 月），頁 6-7。汪迪民在前言交代，許多文章的文題是他代擬的。汪迪民：〈徵文的始末〉，《文藝大路》第 2 卷第 1 期（1935 年 11 月），頁 1-2。

範學校、後受聘於中山大學。著有《建安文學概論》、《唐代文學概論》、《曹植與洛神賦傳說》、《曹植評傳》，是當時頗有名氣的古代文學研究者。為何侯汝華要向古典文學學者討教新詩藝術問題？沈又為何要將覆信公開？這會否是侯氏的一種策略性創作宣言？<sup>32</sup>此信以沈達材鼓勵侯汝華由象徵派進入「以平淡字句表達豐富的情感」之嘗試，<sup>33</sup>然後引用《詩經》、陶潛、錢起的詩例，去說明侯氏詩的平淡境界內延。這些詩例相當重要，因為沈氏藉此申述了平淡不僅是語言的問題，更是詩歌氣象之呈現。是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等詩都重在以意象來呈現平淡境界，「他是表現的，不是敘述的，是有靈感的，不是乏味的」，要使「平淡的字句，不成為呆板滯拙的病態，他必須以情感作中心」。<sup>34</sup>由美感的探索，到情感的表現，是該文描述侯汝華詩歌追求的重點，文中引述之侯氏詩歌〈水手〉，亦是這段時間的作品。<sup>35</sup>沈達材覆信的主要觀點，是重視詩之情感。他認為詩有「真美」，古典詩重視含蓄，但發展至清代神韻，過度追求

<sup>32</sup> 侯汝華初入詩壇不久，他的朋友兼七星燈文社成員劉心（即廖宗翰）曾在《橄欖月刊》上發表〈論侯汝華的詩〉，該文當是第一篇見於文藝雜誌上論侯氏詩的文章，文中引用的詩歌有些未見刊於他處。劉心：〈論侯汝華的詩〉，《橄欖月刊》第34期（1933年7月），頁76-93。

<sup>33</sup> 這是沈氏覆信第一段引述侯汝華來信的話，全句為「讀了你的來信，我真不勝慚愧！我是不會寫詩的，怎夠得上批評？不過，你說你『已決定走「以平淡的字句表達豐富的情感」的路』，這卻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在贊成你的主張之外，也來說一說我的鄙見吧！」沈達材：〈論詩——致侯汝華先生〉，《海濱文藝》1936年第2期，頁50。

<sup>34</sup> 同前註，頁50-55。

<sup>35</sup> 侯汝華：〈水手〉，頁28。此詩亦見《海上謠》。另一首〈水手〉見於《海濱文藝》1936年第2期，頁1，與沈氏覆信同刊一期，估計沈氏所指的是《現代詩風》上那首。《海濱文藝》上之〈水手〉後來另刊《新詩》1936年第1期，頁21-22，刪除了原詩末二行。侯汝華有兩首〈燈下〉，一見於《文學時代》第1卷第6期（1936年4月），頁71-72；另一首題為〈燈下——有贈〉，見於《六藝》1936年創刊號，頁19。但二篇皆非沈達材引述之詩歌。《文學時代》乃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的文藝雜誌，由1935年11月創刊，1936年4月停刊，共6期。

超脫，忽略內在情感，而剩下「空架子」。現代新詩，又缺乏含蓄，影響詩的「真美」。最理想的詩應該是在字句之外，能夠想像和領會其情感。沈氏的論述調和了古典詩和新詩的矛盾，這並非因為他在文中同時挪用古、今詩例，而是他將詩歌看成情感的宣洩、滲透和表現，而不是敘述和顯露。故此，這不再是一個語言問題，亦應和了現代派對汲收古典詩營養的寫作特點。<sup>36</sup> 侯汝華這時期的詩歌廣納古典意象，沈達材譽其「平淡中見出豐富的情感」，並予以文藝理論上的支持，讓讀者得知侯之現代詩情是如何蘊釀和流出的。

沈達材覆信又指出情感的範圍必須擴大至社會，不能只訴說個人情感：

詩人應該有廣大的襟懷，有偉大的愛來同情於社會，於人類。這樣的情感才算豐富，才算偉大。<sup>37</sup>

他明白地說這是追求「詩的真實」以彌補象徵派詩人之所忽略。他指出杜甫、哥德的詩篇同樣有豐富的情感，同樣同情社會和人類。所以現代人寫詩，也應該從生活中尋求養料、生命，去豐富自己的情感，才能做到「詩的真實」。考察侯汝華在《紅豆》上發表的作品，確實能體現沈氏覆信裏的觀點，例如寫盲樂女：

盲樂女是有  
不見天日的憂鬱的，  
人家說她已失掉眼前的誘惑，  
而她的胡弦却愈響愈近了。

寫出了行人聽到胡弦聲漸近，對盲樂女的遐想及同情。又如〈黑夜的鐵匠〉其

<sup>36</sup> 學界對現代派如何吸納古典詩歌元素，已有不少成果。例如李怡指戴望舒在現代的藝術自由條件下，讓溫庭筠、李商隱式的相思在其詩歌繼續進行。李怡：《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增訂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00-204。吳曉東更就「扇」、「樓」等意象，仔細地分析了現代派的詩歌母題與古典文學的關係。吳曉東：《臨水的納蕤思：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藝術母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72-111。

<sup>37</sup> 沈達材：〈論詩——致侯汝華先生〉，頁54。

中一節：

只有他最懂得  
鐵鎚子的重量  
和火種的繁息的，  
但他不會知道隔鄰的  
少女怎樣迷弄男人。

也同樣以一種距離，去測量和感受鐵匠對物對人的認知與迷茫，這種題材在侯汝華早期的詩是很少見到的。從這時期的詩作確可看到他嘗試從象徵主義中走出新路，若將上引「創作態度」徵文及沈達材覆信並置，可以看到創作和論點之間的緊密呼應。「情感範圍的擴大」不僅是多寫非自身的人物、更不會是以代言體方式去虛擬自己沒有的經驗，而是以有情的眼光去感受更廣闊的世界、同情社會上各種各樣人物。所以，他的詩作和主張並沒矛盾，反而表達了詩歌可以呈現更深更廣的情感真實。其實，即使寫個人情感，侯汝華這時期的詩也展示頗不一樣的格調。以刊於《紅豆》的〈末日〉為例：

昨夜的雪多飛了幾片吧  
再沒有鵝絨被裏的溫柔  
夢裏的春天  
已隨枯葉而凋落了，  
Cors 的響聲  
挾著未日的感情  
抑制不住的傷心  
便寄眼淚於幽嘆嗎？  
那白日迷惘的塵沙  
山壑亦為之作寒鴉色了。<sup>38</sup>

<sup>38</sup> 侯汝華：〈末日〉，《紅豆》第3卷第4號（1935年10月），頁27。該期《紅豆》為「吉伯西專號」。

詩寫得有些像「無題」，沒有落實一事，抒寫掌握不住的感覺，「末日」只是喻體。鵝絨被子的不存、夢裏春天的遠逝呈現的虛妄感，Cors汽車響號、幽嘆與白日塵沙如隨時可遇的末日訊號，山壑點染的寒鴉色，帶來的不必是王昌齡〈長信秋詞〉的昭陽日影，而是末日感覺的持續與堅實。比較前文引用侯氏早期的〈傍晚〉，同樣寫情緒，但前者以象徵方式將詭異意象拼湊，後者則以淺近易知的經驗去呈現深沉複雜的情感。回看沈達材覆信對「平淡字句表達豐富情感」的演繹，以上的詩歌不正是最妥貼的詩例嗎？

侯汝華在《紅豆》活躍之時，正是其詩藝最有進境之期；香港給予了侯汝華刊詩的平台，侯汝華亦以優秀的詩歌作出回贈。侯氏此期的詩歌產量及質素俱佳，《紅豆》的實力亦替其作品作出具成效的宣傳。此後他逐漸躋身現代派重要詩人之列，固其宜也。依此，我們看到《紅豆》的編採眼光，亦能側面審視香港文藝雜誌對內地詩歌流派的影響。侯汝華長時間缺席於現代文學研究中，自然跟侯氏的早逝，無法延續其詩歌創作生命，也不可能像部分現代派詩人出現往民族、往國防的轉向有關。<sup>39</sup> 當今學者對侯汝華的研究，有著恢復其文學史地位的作用。<sup>40</sup> 然而，研究侯汝華幾乎難以脫離香港文學的框架，最熱衷研究侯汝華的亦是香港學者，數十年來也只有香港文藝雜誌辦過侯汝華專

<sup>39</sup> 例如徐遲。而當代學者探究現代派詩人時，亦頗多跟當時的民族危難相勾連。甚至有學者試圖論證侯汝華也有轉向加入國防文學的動機及舉措。鄭少斌：〈作為革命詩人的侯汝華〉，《客家文博》2018年第1期，頁3-6。

<sup>40</sup> 例如孫玉石認為侯汝華是受李金髮影響而加入象徵派隊伍最有成就的青年詩人之一，孫玉石：《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頁149。黃仲鳴繼承此說，以此角度分析侯氏詩的作法與「流興」特色，該文的「流興」指古典感興在現代語境的流變物。黃仲鳴：〈水手的絕唱——追跡侯汝華的《海上謠》〉，《文學研究》創刊號（2006年3月），頁85-96。吳心海就指侯汝華是二三十年代表徵派的重要詩人、國防詩歌的作者。吳心海：〈沒有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象徵派詩人侯汝華生平考〉，頁97-105。朱少璋更認為侯汝華是三十年代不能繞過的作家。

輯。<sup>41</sup> 追跡侯汝華，是否同時表現著對香港文學的某種關懷？這是下一節將要探討的問題。

#### 四、遺忘中的焦慮，焦慮下的追問

回到現場只是研究者追問的問題之一，他們的使命和興趣遠不止於此。研究一個作家，文學史論述往往是判定價值的良策。研究對象在縱橫兩個維度中如何被安放，佔據一個座標，會較在不同維度中游移或者越界讓人安心。不過，讓研究者感到焦慮的，包括研究對象從座標上被移開或者抹除，因為這種情況往往牽一髮動全身，特別涉及先後脈絡和影響研究的，就有如崩盤的不安。<sup>42</sup> 本文曾指出李育中之一言，對侯汝華「香港詩人」的身份界定產生衝擊；本部分要解決的是，當侯汝華已然成為香港文學的記憶之一部分，而這部分的記憶受到質疑甚至導向遺忘時，研究者的判斷反映他們正在追問某些問題，這些問題跟香港文學本身又有何關係，或者能否啟發研究香港的不同可能。以下，將提到兩種來自遺忘的焦慮及追問，一是以陳智德為代表，二是關夢南及朱少璋等人。他們都同時兼有香港本地作家和研究者的身分，但採用了不同的進路。

陳智德是當代最早專門研究侯汝華的研究者，早在 2002 年，他主編的《詩

<sup>41</sup> 分別是陳智德主編的《詩潮》創刊號「侯汝華小輯」，及《聲韻詩刊》的「侯汝華專輯」。後者包括劉偉成〈水手與腔棘——談侯汝華詩之「不能繞過」〉、朱少璋〈《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的「據本」意義〉、Mark King Bradley 英譯的侯汝華詩七首（〈迷人的夜〉、〈海上謠〉、〈夢〉、〈夜〉、〈水手〉、〈夜〉、〈水手〉）。劉偉成的博士論文《盪懷生家國：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有「為達即為信：中國新詩與象徵主義」一章，有一節談侯汝華與現代派，結論亦有重新檢視侯汝華的意義。筆者撰文時，該文仍未開放予公眾閱覽，僅有目錄及提要，故未知其具體觀點。劉偉成：《盪懷生家國：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博士論文，羅貴祥先生指導，2019 年）。

<sup>42</sup> 例如《二十四詩品》的研究，作者是不是司空圖就曾引起很大的爭議，如果答案是「否」，就顛覆了一系列關於《二十四詩品》對唐宋元文藝的影響研究。

潮》創刊號就開闢了侯汝華專輯（名「侯汝華小輯」），包括專論〈論侯汝華〉、轉錄李金髮〈序侯汝華的「單峯駝」〉、輯「侯汝華詩作四首」（〈歌兩章〉、〈晚霞〉、〈休息〉）、轉錄陳江帆〈聞侯汝華病歿〉詩及徐遲〈憶侯汝華〉文章，及「侯汝華作品編目」。<sup>43</sup> 這種格局實際上已涵概文學史縱橫兩面，他的判斷也為後來研究者採用。<sup>44</sup> 次年，陳氏在《三、四〇年代香港詩選》選錄了侯汝華四首詩，分別是〈水手〉、〈晚霞〉、〈休息〉和〈我的舊提琴〉，這四首詩除了〈水手〉早為沈達材和聞一多選本提及，已是侯氏名作外，其餘三首都是首見於詩選，而〈晚霞〉和〈我的舊提琴〉更在後出的關夢南《香港新詩：七個早折優秀詩人》選入。依此，或許不足以判斷陳智德拓寬了侯汝華的名作範圍，但他選詩的眼光，應當受其對侯汝華詩歌的判斷指引。2004年，陳智德的博士論文〈論香港新詩 1925-1949〉同樣以侯為「香港早期詩人」，並說「李金髮與林英強、侯汝華等早期的象徵派詩人剖示世界的方法，正為三〇年代的香港新詩提供了『花呀月呀』以外的選擇」。他的分析無疑是從詩歌審美特徵上連繫了李林侯跟香港新詩二者；而三人當中，又以侯汝華在三十年代的香港曝光率最高。2004年，陳又編成《三四〇年代香港新詩論集》，當中又輯錄了李金髮替侯汝華和林英強寫的兩篇序。從以上材料的編選（包括詩歌、文章），及論文的論斷，可見陳智德一直試圖替侯汝華奠定早期香港重要詩人的地位；並且，一方面強化其跟象徵派的淵源（李金髮序文重複入選），另一方面又說明侯汝華已從象徵派脫胎，直接參與「現代派詩形」的構建。請看以下一段話：

侯汝華的創作路向則可說是從接受李金髮的影響開始，但其詩作的意義或不只於作為一個李金髮的繼作者，而是在李金髮詩興漸減、創造社詩

<sup>43</sup> 《詩潮》第1期（2002年2月），頁68-74。

<sup>44</sup> 朱少璋編《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輯錄了〈論侯汝華〉一文，犁青主編《香港新詩發展史》有獨立侯汝華一小節，當中的主要判斷和詩歌選析，應來自〈論侯汝華〉此文。

人亦轉向左翼文學的三十年代，與戴望舒、何其芳、李白鳳、陳江帆等詩人共同經歷從象徵到現代的過渡。<sup>45</sup>

侯汝華的複雜性在於他不僅是「李金髮的得意弟子」，在短短數年的詩歌創作生涯裏，他已經歷從「象徵到現代」的變化，其詩歌在香港參與當時得令的現代派的發展，這等於論述：香港詩歌即時性地參與了中國詩歌的發展。這種論調尤易引起對香港文學和中國文學關係有興趣的研究者注意。翻檢此後出現的香港早期新詩著述，提及侯汝華的基本上都採納了陳智德的觀點。<sup>46</sup>

不過，必須要指出，陳智德後來對於侯汝華的「香港作家」身份是有保留的。上文提到 2009 年李育中否定了侯為香港作家之說。以一句話作出質疑，或者未足以顛覆成說；但李育中說話的邏輯直接指向作家的經驗與身份的關係，就成為材料編輯者下判斷時不得不面對的問題。2014 年，陳智德編《香港文學大系·新詩卷》出版，該書並沒有收錄侯汝華，但有收錄曾短暫居港、後移居南洋的林英強。作為文學材料編整者的陳智德，採用了保險而且負責的方法：在找不到證據支持侯汝華曾在香港生活的證據時，暫時將他剔出香港詩人之列。表面看來，這判斷推翻了他一直為侯汝華所做的工作，但如果將視角稍稍往前推移，就會發現陳智德曾經就香港作家、香港文學的定性問題作過非常深入的思考。2008 年，《現代中文文學學報》推出了關於香港文學的專題，陳智德在該期發表了〈起源及其變體——香港作家、香港文學與香港新詩〉一文。這篇文章一邊梳理曾經出現對於香港作家定義的各種說法，一邊表達對於

<sup>45</sup> 陳智德：〈論侯汝華〉，頁 67。

<sup>46</sup> 如黃仲鳴〈水手的絕唱——追跡侯汝華的《海上謠》〉，頁 85-96，黎青主編的《香港新詩史》，述說香港現代派詩人群體時就有論及侯汝華，觀點亦非常接近陳智德〈論侯汝華〉。黎青主編：《香港新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年），頁 63-66。即如趙稀方研究《紅豆》兼及侯汝華時，亦採用了李金髮和中國新文學的影響說。趙將「半唐番體」視為香港早期文學的重要地域特點，而指出這是受李金髮影響，香港「半唐番體」代表詩人侯汝華和林英強也是李金髮自覺的傳人。趙稀方：〈中國現代詩的「飛地」——被遺忘的香港《紅豆》現代詩群〉，頁 5-7。

處理這個問題的困難處境：

從歷史上看，香港作家的成份從不固定，猶如歷史上香港居民的流動性一樣，定義香港文學和作家的困難，正在於此。如何界定或取何種標準，將因時代、處境或需要而異，編一部作家小傳與編一部小說選的標準容有差異……。<sup>47</sup>

更需注意的是他接下來所說的話：

由於戰爭和政治原因，三、四〇年代的香港詩人流動性高，他們當中有部分土生土長，部分由外地居港工作然後北返，亦有部分屬過境停留，部分是在本地開始寫作的「無名詩人」，部分在內地已是知名詩人，其中絕大多數不會自稱為「香港詩人」。三、四〇年代的社會環境亦不同於現時，實不能從今天對「香港詩人」的理解（例如在香港出生或居留並發表詩作者）去界定三、四〇年代的「香港詩人」。另一方面，相對五〇年代以後比較獨立的發展，早期香港新詩的特色，也是複雜之處，正在於其與大範圍下整個中國新詩的關係。早期香港新詩的界定並不單是技術或先決問題，而是與整個三、四〇年代香港新詩的內在構成相關，香港新詩當然源自中國五四時期的新詩，但其往後的內在變化也逐漸形成了與母體不同的性質。<sup>48</sup>

這段說話撇除了以單一座標作為研究香港新詩的先決條件，明瞭香港新詩的內在結構，及其如何與中國新文學構成關係及延伸出獨立發展，將更符合「港情」，更能說出早期香港文學的特殊性。在這個問題上，陳智德援入了地域文學的概念，比照了上海研究者「上海文學的『內涵和外延性大大地大於上海作家』」的說法，點出了傳統地方志思路並不適用於香港文學。他最後要論證的是：

<sup>47</sup> 陳智德：〈起源及其變體——香港作家、香港文學與香港新詩〉，《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及第9卷第1期（2008年1月），頁160。

<sup>48</sup> 同前註，頁161。

早期香港新詩的香港性正在於其結合了內外關注的特色，最終香港新詩不單指在香港出版發表的詩，而是指向一種關係、一種類型、結構和視角，在三、四〇年代，這關係、類型、結構和視角是處於不自覺地變化和形成的初步階段。<sup>49</sup>

顯然，香港作家身份的爭議，並無礙於論述香港新詩的特殊性及意義。當爭議的問題不再是研究的前提時，它的顛覆性其實已被消解。故此，陳智德當時不一定已掌握侯汝華在香港的行跡有無，也不可能預知李育中百歲壽辰之話，但他所思考的問題和結論，已然為將會出現的質詢預先準備了答卷，並順帶重檢了研究香港早期文學的思路及方法。這種重檢並不限於陳智德，由陳國球領軍的《香港文學大系》，編委們就在「香港作家」的判定問題上有過激烈爭辯。最後決定由各卷主編斟酌。陳國球在「總序」說：

大家的默契是以「香港文學」為據，而不是歧義更多的「香港作家」概念，尤其後者更兼有作家「自認」與他人「承認」與否等更複雜的取義傾向……「香港」應該是一個文學和文化空間的概念：「香港文學」應該是與此一文化空間形式共構關係的文學。<sup>50</sup>

由定義、身份引來對香港文學「應該是什麼」的追問，是甚具建設性的調整。將一個作家從文學史裏遺忘好像很容易，粗暴地把他拿掉，從此不提就可以。但如何看待他曾經在該段文學史留下的足跡及記憶，能否藉著更多維度的思考，更精準地描述香港文學的特殊性，不正是文學研究者分所當為的工作嗎？陳國球序陳智德新書《根著我城：戰後至二〇〇〇年代的香港文學》時提到，此書是寫香港文學如何被遺忘，如何不被遺忘，文學承載著一代香港人的記憶，一切存有過的經驗如何成為一個城市的記憶，鑲嵌成獨一無二的本土。<sup>51</sup>

<sup>49</sup> 同前註，頁 163。

<sup>50</sup> 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總序〉，陳國球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卷一》，頁 24。

<sup>51</sup> 陳國球：〈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序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二〇〇〇年代的香港文學》〉，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二〇〇〇年代的香港文學》（臺北：聯經出版社，2019 年），頁 4。

本文認為，沒有記憶，就沒法遺忘；選擇遺忘，抗衡遺忘，面對記憶的混雜和網絡交錯，梳理出一條條有序的脈絡，而不違本真，是認識自我的重要方法。這種記憶與遺忘的來往拉扯，煎熬著研究者。陳智德在該書的序中說：

本書討論香港文學的本土意識和根著感時，一再提出當中的無力和不可能，有時，我覺得個人的文學志業也隱約近似。我不知是什麼力量驅使我寫成這本書，彷彿那是屬於另一個時空的聲音。<sup>52</sup>

陳氏在書成一年前曾在香港大學進行題為「流動與根著：戰後至二千年代香港文學的發展模式」的演講；假如將「流動」與「根著」概念上推至侯汝華跟香港文學結緣的三十年代，侯汝華的詩歌由「流動」各地到「根著」於香港文壇，他已經是香港文學的一個部分，無法輕率地「告別」香港文學。

詹姆斯·克里佛德（James Clifford）曾表示現代人類學者關注的很少是「根著」某處的對象，他們多是遊行者、工人、朝聖者等。而「本地」無可避免地受到挑戰，因為一個社區如何劃界，如何定義其本地人（insiders）與外來者（outsiders），都不是易事。<sup>53</sup> 克里佛德的研究點出了流動人口與遷移對當代人類學研究的重要，他後來對原住民的研究，更留意到從地方主義轉到一種基礎更廣濶的原民性，而當中關涉到不同的文化生產和消費領域。他援用了「召喚」和「銜接」兩個概念，嘗試解釋不同文化、政治力量衝撞而成的複雜概念空間。他說：

如果說「召喚」可以解釋權力是如何建構出社會存在（existence），「銜接」則可以讓我們注意到「連結」與「解連結」的歷史過程，為表演政治（performative politics）騰出空間。在後者，被強調的是策略性、關係性的能動形式（forms of agency）。<sup>54</sup>

<sup>52</sup> 陳智德：〈自序〉，同前註，頁 16。

<sup>53</sup>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路徑：20 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 18-19.

<sup>54</sup>（美）詹姆斯·克里佛德著，林徐達、梁永安譯：《復返：21 世紀成為原住民》（苗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頁 324-329、357-364。

其實，上文所述陳國球、陳智德等人對香港文學主體性思考與之相類，他們欲讓「香港文學」從文學史大敘述中的正反二元中釋放出來。即如須文蔚評《根著我城》時提到：

陳智德巧妙運用了「根著」的譬喻，說明了香港作家藉由路徑（routes），打破了國族主義或族裔的地域觀念，同時藉由移動的路徑（routes），創造了香港文學新的根源認同（roots），無邊蔓生於我城，乃至於香港之外。<sup>55</sup>

又：

顯然陳智德放棄傳統國族、區域與源流式的「香港文學」定義方式，而是以德勒茲譬喻的塊莖式與游牧式思維，把作家從傳統史觀的區隔與局限中釋放出來，讓誕生在港的文學作品得以安生於城中。<sup>56</sup>

如此，侯汝華詩歌的跨區域傳播，香港文化空間的流動性，本來就是了解「香港文學」這個「概念空間」的一個部分。王德威關於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的論述曾引用「根」、「勢」的概念，闡釋前人對「中國主體性」的思辯。他指出以「根」為出發點的華語語系論述，無論贊成與否都不能擺脫空間的政治學，而「勢」能暗示一種情懷或姿態，其張弛進退能夠通向實效發生之前或之間，乃至不斷湧現的變化。<sup>57</sup> 王德威的論述，呼應了唐君毅、李歐梵、黃維樑、史書美等人的相關論說，亦牽引出後來對華語語系文學許多的辯論，這不是本文論旨所在，故不贅言，但已看到學者如何調整觀察視域，讓抵抗與建立同時在所關切的主體性論述裏共生流動。

抵抗遺忘的方式不止一種。就侯汝華「香港詩人」身分引起的爭議，香港文學研究者也有其他的消解方法。關夢南申領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研究香港

<sup>55</sup> 須文蔚：〈一場對抗遺忘的文學史抗爭——評陳智德《根著我城》〉，《方圓》2019年秋季號，頁146。

<sup>56</sup> 同前註，頁147。

<sup>57</sup>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學報》第4期（2013年12月），頁1-17。

新詩。他研究了七個早逝的香港詩人，包括侯汝華，自然也需要面對侯氏算不算香港詩人的問題。他一方面說侯汝華和易椿年「應是香港三十年代最早一批詩人的其中兩個高音」，一方面說「廣義的香港詩人來自粵港，而粵港又與北京、上海、重慶、南京等新詩的重鎮互動」。<sup>58</sup> 2018年，另一位香港作家兼學者朱少璋出版了《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讓侯氏的詩文作品得以較完整的面貌重現人前。他在前言說：

事實上，無論侯汝華算不算是「香港作家」，他都絕對夠得上是中國現代文壇上一個「不能繞過」的作家。……他以港粵文壇為立足點，透過出版和投稿，向全國發揮他對現代文壇的影響力。<sup>59</sup>

關、朱二人採用了拓潤邊界的方法，將侯汝華身份演繹成更寬闊的「粵港」概念；而強調侯氏在中國現代文壇的地位、或者重申香港跟內地城市互動特點，自然符合三十年代文藝語境，<sup>60</sup> 但似乎也是回歸中國文學史大敘述的策略。在作家研究而言，此策略或有「多備一說」的助益，也能再次證明香港學者、作家對研究侯汝華的熱衷。但回歸大敘述、等待認證與和鳴，最終被消解的會否是香港文學本身？抵抗遺忘之初衷會否走向被遺忘的終局？

從以上諸說可見，香港學者不斷追問香港文學的「邊界」（boundary）及「視界」（field of vision）問題。這又可以理解成對「香港文學的本質」和「香港文學的閱讀方法」的沉思。面對強力的大敘述、面對不可抗逆的收編，如何表述自身的獨特性、如何抵抗遺忘、拒絕成為一個簡化的地理名稱？<sup>61</sup> 侯汝

<sup>58</sup> 關夢南：〈一種橫向的研讀〉，《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頁61、3。

<sup>59</sup> 朱少璋：《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頁ix。

<sup>60</sup> 當時粵港文人往來頻繁，即如《紅豆》主編梁之盤也常往來廣州和香港，他甚至到過中山大學旁聽。林英強赴南洋前，也從廣州先到香港。徐遲亦曾流亡到香港，一直跟廣東文壇保持聯繫等。

<sup>61</sup> 早期香港文學史的寫法是以「香港文學首先中國文學」為前提，潘亞墩、汪義生《香港文學史》就採納了梁錫華「香港文學是叨了中國政策之光，才有今天的地位」的說法，以中國大陸的影響為前提。潘亞墩、汪義生：《香港文學史》，頁4-7。又如劉登翰、謝常青也採用這種前提。但這種說法並不受香港學者歡迎，如陳國球及

華的冒起、早逝、被淡忘，倘若三十年代沒有香港《紅豆》這平台，後來沒有香港文學史這框架、沒有香港作家身分這爭議，「侯汝華」或許只是「李金髮的追隨者」、「現代派的年輕詩人」這何等簡化的名詞而已。<sup>62</sup> 侯汝華以創作及宣言，擺脫象徵派的籠牢，應當有以文藝宣洩個性、甚至追求不朽的動機？其成或不成，永遠年輕的他來不及做太多工夫，只能依傍文藝論者的眼界與健筆。香港學者論述侯汝華時呈現之焦慮，何嘗不作如是觀？由他們指引出來的路徑，是否能讓人記住香港文學之獨特，抑或僅是廣大中國版圖上的一隅？就只能觀望後代如何記載。

## 五、結語：抒情與記憶作為文學的力量

梳理侯汝華跟香港文學千絲萬縷的關係，發現香港文學能夠造就像侯汝華一樣的精彩作家，助其建立文學史地位。但是，論述侯汝華及其文學成就時卻不一定需要重視香港文學，更不必藉此探問香港文學的本質。如果侯汝華是香港作家，或者可通過他的作品去幫助說明早期香港新詩的特點；但如果侯氏連香港作家都談不上，那研究問題只需要是侯汝華、象徵派現代派、或者現代

---

王宏志便曾撰文反擊，鄭樹森、盧瑋鑾、黃繼持等人在「三人談」亦對部分過於強化五四及國內意識形態對香港文學影響的說法表示懷疑。樊善標曾對香港人對香港文學史的撰寫和理念反響作過詳細析述，也述及香港文學「主體性」的探索。見樊善標：〈文學史「如何香港」的設想——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香港文學「三人談」與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總序》〉，《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16年9月），頁91-128。在此之前，古遠清也簡要清理過香港回歸前後的香港文學史撰寫熱潮，古遠清：〈香港文學史的七大誤區〉，《南方文壇》2009年第2期，頁67-71。

<sup>62</sup> 辛笛1981年到香港中文大學演講，憶述三十年代受戴望舒影響而投稿到《現代》雜誌的詩人，就提到侯汝華。侯汝華在當時藉藉無聞，辛笛也只提到侯氏名字而已。他說「跟他跑的，很多人當時在《現代》雜誌上，寫了很多詩的。大家可能也都曉得，譬如這個人現在不知道還在不在，侯汝華。」辛笛：〈論中國三十年代現代派詩——1981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6期，頁9。

文學史。論述者利用香港文學作為「材料」去完成以上的論述目的，香港文學的責任已經完成，可以被淡化、被拋棄、被遺忘，這就是過去站在中國文學史大敘述立場下討論侯汝華的情況。那末，什麼情況下香港文學才會重要？孜孜不絕地論證侯汝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就能得償所願嗎？若未能說服學界相信侯汝華乃現代派「不能繞過的作家」，那侯汝華之被記起就只能隨緣待知音，更毋論要藉此去記憶僅作為「材料」的香港文學。本文發現，侯汝華研究者面對其香港作家身分的質疑時，採取了不同的進路，以消解質疑；本文認為，他們表達了對於香港文學將要被遺忘的焦慮。讓筆者在意的是，這批研究者都是香港人，他們的方法，乃為香港文學尋找意義的方法——強調文化空間的獨特、或者述說支援大敘述的作用，哪種方法較為有效，在當下時空不能論定，姑待後見之明。本文第二、三節論述侯汝華的詩風變化及文學地位，第四節分析香港學者回應質疑時的反應。前者正是著眼香港文學的作用，後者即探究香港學者如何為香港文學尋求定位及價值的方向；花費篇幅於前者，並不為了放大香港文學對現代文學的重要性，而是針對研究空白，作出香港文化空間上自圓其說的嘗試，作為第四節的鋪墊。以侯汝華個案，檢視由作家身分引伸的香港文學本體性思辯，才是本文的預設論述指向。

香港研究者的文章，情感躍然紙上。上文引述陳智德以「根著我城」來認識和抵抗遺忘時的惘然感謂，已見一斑；即如採取緊貼中國文學史大敘述策略的關夢南，處理侯汝華等人的詩歌時，也充滿哀思與同情；<sup>63</sup> 為侯汝華作品作出大量文獻整理工夫的朱少璋，自謙沒資格分析研究侯氏作品，但不忘表達對侯氏作品的喜愛，而屢屢表示侯汝華是應當受到重視的新文學名家，就更讓人

<sup>63</sup> 關說：「七個早逝的詩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詩的執著、他們生命的目的，有很大部分是因為詩。他們有歡近的時候，但更多的是不稱意。沒法：高傲、敏感、自負、才情橫溢的詩人，註定落落寡合於世。何況部分詩人『身無長處』，只有詩。做一個詩人，不做生計的奴隸，自古艱難，於今猶甚。然而一如小草，野火燒後，不知甚麼時候，它又長到你深夜的床前。」，關夢南：《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頁 11。

感到其替侯氏被文學史淡忘的不值。<sup>64</sup> 他們的焦慮來自其所關懷對象之逐漸消失，或者主體性迷朦；反過來說，這也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文學的力量的深信不疑。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認為人類的焦慮存在於文學之中，並轉化成對經典性的企求，以長久留存在群體記憶之中，這使他深信捨棄文學經典去重新定義文學是徒勞的。<sup>65</sup> 王德威論述「有情的歷史」時，曾引用沈從文在四川時的家書，指沈氏篤信的歷史由多種悖論構成，其中有深刻活潑的歷史、即「有情的歷史」存在，而文學是這種歷史最有力的見證。<sup>66</sup> 中國古代之謂「不朽之盛事」、布魯姆所言之「寫作是為了克服死亡」、<sup>67</sup> 朱少璋欲讓侯汝華成為現代文學裏不能繞過的作家、陳智德和陳國球等人追問香港文學獨一無二的主體性……這都是深信文學力量能夠發現主體、延續生命和建構傳統的表現。也許正是強烈的同命感牽繫著彼此，所以香港學者才這麼熱衷於「記憶」侯汝華吧？

<sup>64</sup> 朱少璋：〈不能繞過的作家——代序〉、〈後記：多補一塊零片〉，《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頁 xvi-xvii、443。

<sup>65</sup> 哈羅德·布魯姆說：「一部文學作品也要引發它要實現的預期，否則它就會失去讀者。文學最深層次的焦慮是文學性的，我認為，確實是此種焦慮定義了文學並幾乎與之一體。一首詩、一部小說或一部戲劇包含有人性騷動的所有內容，包括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在文學藝術中會轉化成對經典性的企求，乞求存在於群體或社會的記憶之中。」又，「西方經典就是以莎士比亞和但丁為中心的。除了他們，我們就只有他們所吸收的東西和吸收他們的東西。重新定義『文學』是徒勞的，因為你無法獲得充足的認知力量去涵蓋莎士比亞和但丁，而他們就是文學。如果要對他們重新定義，那只能祝你好運。」（美）哈羅德·布魯姆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頁13、412。

<sup>66</sup> 王德威著，涂航等譯：《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年），頁102-107。

<sup>67</sup> 哈羅德·布魯姆說：「傳統告訴我們，自由和孤獨的自我從事寫作是為了克服死亡。我認為自我在尋求自由和孤獨時最終只是為了一個目的去閱讀：去面對偉大。這種面對難以遮蔽加入偉大行列的慾望，而這一慾望正是我們稱為崇高的審美體驗的基礎，即超越極限的渴求。」〈哀傷的結語〉，（美）哈羅德·布魯姆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頁414。

有些人離開了，有些人留下了，有些人錯過了。文學史可以是經典史，也可以理解成淘汰史。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是文學史家所擅長，<sup>68</sup>然他們卻未必有力掌控文學之成為記憶。侯汝華的死亡，正值抗日時期，文藝界發起國防文學的號召；相傳侯汝華生前也投身過這個戰場，但未及留下讓人銘記的痕跡。<sup>69</sup>1938年10月，徐遲在香港《星島日報·星座》發表了一篇記念侯汝華的短文。讓人奇異的是，徐遲和侯汝華雖同為現代派詩人、在相同的文藝期刊上刊過作品，但二人從未會面；所謂記憶，如何談起？他說：

我沒有和他會面過，也沒有和他通過信，然而從他第一首發表的詩裏我就認識他，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詩人了。我認識他，並且自然很想念他，還在許多地方使我在回憶中有到他，他時時使我聽到一些話，令我微笑，令我悲哀；也會使我高興，也許還會叫我生氣，我們竟是一對老朋友。

又說：

而當他在《現代詩風》上，把〈水手〉一詩登載出來是，我更不懷疑，我像是看他寫這首詩的。不久後，時代圖書公司的新詩庫中，他又出了一本集子：《海上謠》，他時時刻刻在我身邊了，我們常娓娓不倦的在

<sup>68</sup> 例如陳國球就曾從文學立科、文學史建構角度論析這問題。可參陳國球：《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sup>69</sup> 下文引述徐遲之悼文，文末寫「正當他開始為這個戰爭歌唱的時候，正當他開始要紀錄一個史詩的時候！我不知有甚麼人可能繼續他的工作？」見徐遲：〈憶侯汝華〉，載《星島日報》星座版（1938年10月20日）。有論者嘗試論證侯汝華生前正致力於國防文學，如鄭少斌：〈作為革命詩人的侯汝華〉，頁3-6。該文指侯汝華除了有革命詩外，生前亦跟林英強創連《東方詩報》，抗戰題材的詩歌為編輯方針，惟因侯之逝世，故僅出兩期停刊。亦有指侯汝華有呈現現代派詩人向左轉的標誌，如趙稀方就引用侯汝華在《紅豆》所刊之詩〈我們的高爾基——悼高爾基長詩之首頁〉作為例子。趙稀方：〈中國現代詩的「飛地」——被遺忘的香港《紅豆》現代詩群〉，頁4-5。

夜深談話。而且，我不僅是他的朋友，還是他的閱讀者。<sup>70</sup>

原來，記憶根本無待於經歷。侯汝華不是水手，但他寫出了〈水手〉；徐遲不認識侯汝華，但他憶念侯汝華；侯汝華不是香港作家，但香港學者藉侯汝華表達對香港文學的焦慮。共感生發，所緣為情？情之所住，即生銘印，從此不易驅離。讀者能用文學的情感力量記住一個詩人，文學研究者也能用文學去記住一座城市的聲色氣味——即使它不曾存在、或者已消失無踪。

（責任校對：邱琬淳）

## 引用書目

### 一、近人論著

王宇平：《漩渦裏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代派」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陳子善先生指導，2009年。

王 瑤：《中國新文學史稿》重版上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文學學報》第4期（2013年12月）。DOI:10.6903/JCL.201312\_(4).0001

王德威著，涂航等譯：《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年。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 1911-1949：文學理論·世界文學·中國

<sup>70</sup> 徐遲：〈憶侯汝華〉。侯汝華雖被認為是現代派青年詩群之一員，但他的早逝並沒有在文壇引起多大關注，只有《中國詩壇》於1939年1月設置了「侯汝華詩人遺作專頁」，並附簡要序文，交代侯氏死訊。悼文也很少，僅見陳江帆和徐遲刊於《星島日報》星座版（1938年10月20日）的一詩一文。吳心海發現施蛰存曾表達過想替侯汝華寫評傳的想法，又推測侯氏好友林英強應有更多紀念侯的文字。吳心海：〈沒有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象徵派詩人侯汝華生平考〉，頁102-103。

- 文學》，上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
- 古遠清：〈香港文學史的七大誤區〉，《南方文壇》2009年第2期。
- 朱少璋：〈不能繞過的作家——侯汝華〉，《明報》明藝版（2017年12月25日）。
- \* 朱少璋：《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香港：滙智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 朱少璋：〈《海上生明月——侯汝華詩文輯存》的「據本」意義〉，《聲韻詩刊》總41期（2018年5月）。
- 朱光燦：《中國現代詩歌史》，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年。  
DOI:10.978.962201/9423\_1
- \* 吳心海：〈沒有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象徵派詩人侯汝華生平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3期。
- 吳曉東：《臨水的納蕤思：中國現代派詩歌的藝術母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李 怡：《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增訂三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 李育中：〈我與香港——說說三十年代的一些情況〉，收入黃維樑編：《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DOI:10.978.962201/9423\_1
- 李金髮：〈序林英強的「淒涼之街」〉，《橄欖月刊》第35期（1933年8月）。
- 李金髮：〈序侯汝華的「單峯駝」〉，《橄欖月刊》第35期（1933年8月）。
- 沈建中編：《施蛰存先生編年事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沈達材：〈論詩——致侯汝華先生〉，《海濱文藝》1936年第2期。
- 汪迪民：〈徵文的始末〉，《文藝大路》第2卷第1期（1935年11月）。
- 辛 笛：〈論中國三十年代現代派詩——1981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

- 講》，《現代中文學刊》第6期（2014年）。
- 東山中學廿周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梅縣私立東山中學二十周年紀念錄》，梅縣：東山中學校，1934年。
- 侯汝華：〈迷人的夜〉，《現代》第2卷第4期（1933年）。
- 侯汝華：〈單峯駝〉，《現代》第3卷第2期（1933年）。
- 侯汝華：〈傍晚〉，《現代》第4卷第2期（1933年）。
- 侯汝華：〈一切創作都是作者的自敘傳〉，《文藝大路》第2卷第1期（1935年11月）。
- 侯汝華：〈詩三首：水手、海上謠、窗〉，《現代詩風》第1期（1935年10月）。
- 侯汝華：〈末日〉，《紅豆》第3卷第4號（1935年10月）。
- 侯汝華：〈西湖小品：黎明〉，《文藝大路》第1卷第6期（1935年10月）。
- 侯汝華：〈水手〉，《海濱文藝》1936年第2期。
- 侯汝華：〈燈下〉，《文學時代》第1卷第6期（1936年4月）。
- 侯汝華：〈水手〉，《新詩》1936年第1期。
- 侯汝華：〈燈下——有贈〉，《六藝》1936年創刊號。
- 施建偉、應宇力、汪義生：《香港文學簡史》，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9年。
- 袁勇麟：〈20世紀香港新詩與外國文學關係淺探〉，《海南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 胡從經：《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香港：朝花出版社，1998年。
- 倪墨炎：〈邵洵美的事業也有其輝煌的時期（下）——出版《新詩庫》和《自傳叢書》〉，《博覽群書》第10期（1999年）。
- 孫玉石：《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
- 孫玉石：《中國現代詩歌及其他》，臺北：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孫作雲：〈論現代派詩〉，《清華週刊》第43卷第1期（1935年）。
- 孫望：《戰前中國新詩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 孫黨伯編：《聞一多全集·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徐 遲：〈憶侯汝華〉，《星島日報》星座版（1938年10月20日）。
- 黎 青主編：《香港新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
- 張振金：《嶺南現代文學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 陳國球：《文學如何成為知識？文學批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 \* 陳國球編：《香港文學大系 1919-1949·評論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
- 陳國球：〈南國西潮——香港早期文學評論與境外文學思潮〉，《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 \* 陳智德：〈論侯汝華〉，《詩潮》第1期（2002年2月）。
- 陳智德編：《香港三四十年代香港新詩論集》，香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2004年。
- \* 陳智德：〈起源及其變體——香港作家、香港文學與香港新詩〉，《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8卷第2期及第9卷第1期（2008年1月）。
- \* 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二〇〇〇年代的香港文學》，臺北：聯經出版社，2019年。
- 崑 南：〈編後話：詩的盛宴〉，《詩潮》第1期（2002年2月）。
- 須文蔚：〈一場對抗遺忘的文學史抗爭——評陳智德《根著我城》〉，《方圓》2019年秋季號。
- 舒 蘭：《中國新詩史話》，臺北：渤海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
- 黃仲鳴：〈水手的絕唱——追跡侯汝華的《海上謠》〉，《文學研究》創刊號（2006年3月）。
- 黃仲鳴：〈李育中〉，《文匯報》副刊采風版（2009年12月19日）。
- 楊國雄：《舊書刊中的香港身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 \* 葉倬瑋：〈在兩道夾縫中綻放——《紅豆》編輯格局探析〉，《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3期（2018年8月）。

- 葉輝：〈三〇年代的「無名詩人」〉，《文學世紀》第2卷第1期（2002年1月），頁53-54。
- 趙稀方：〈中國現代詩的「飛地」——被遺忘的香港《紅豆》現代詩群〉，《北方論叢》2016年第2期。
- 趙稀方：《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香港：三聯書店，2019年。
- 劉心：〈論侯汝華的詩〉，《橄欖月刊》第34期（1933年7月）。
- 劉偉成：〈水手與腔棘——談侯汝華詩之「不能繞過」〉，《聲韻詩刊》總41期（2018年5月）。
- 劉偉成：《盪懷生家國：中國新詩與現代性 1917-37》，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博士論文，羅貴祥先生指導，2019年。
- \* 劉登翰：《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 樊善標：〈文學史「如何香港」的設想——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香港文學「三人談」與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總序》〉，《政大中文學報》第25期（2016年9月）。DOI:10.30407/BDCL.201606\_(25).0003
- 鄭少斌：〈作為革命詩人的侯汝華〉，《客家文博》2018年第1期。
- 鄭政恆：〈教育、藝術、娛樂、商業？——第一次電影 清潔運動的史料發掘與闡述〉，《文學評論》第15期（2011年8月）。
- 潘亞暎、汪義生：《香港文學史》，廈門：鷺江出版社，1997年。
- 隱郎：〈論象徵主義詩歌〉，《今日詩歌》九月始創號（1934年9月）。
-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
- \* 關夢南、葉輝主編：《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上、下冊，香港：風雅出版社，2006年。
- 關夢南：《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香港：風雅出版社，2012年。
- 鷗外鷗：〈搬戴望舒們進殮房〉，《廣州詩壇》1937年第3期。
- \*（美）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著，江寧康譯：《西方正典：偉大

作家和不朽作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

(美) 詹姆斯·克里佛德 (James Clifford) 著，林徐達、梁永安譯：《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苗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Bloom, H. (2005). *Xifang zhengdian: Weida zuojia he buxiu zuopin*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 (N.-K. Jiang, 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
- Chan, Zhi.-D. (2002). Lun Hau Ruhua [Discussion on Hau Ruhua]. *Shi Chao* [Poetry Waves], 1, 65-67.
- Chan, C.-T. (2008). Qiyuan ji qi bianti: Xianggang zuojia, Xianggang wenxue yu Xianggang xinshi [The origin and its variant: Hong Kong writers, literature and poetry]. *Xiandai Zhongwen Wenxue Xuebao*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8(2) & 9(1), 159-170.
- Chan, C.-T. (2019). *Genzhe wocheng: Zhanhou zhi 2000 niandai de Xianggang wenxue* [Rooted in my city: Hong Kong literature from the postwar years to the 2000s].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Chan, K.-Q. (Ed.). (2016). *Xianggang wenxue daxi 1919-1949: pinglun juan yi* [Compendium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1919-1949: Literary criticism I].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 Zhu Sh.-Zh. (2018). *Haishang sheng mingyue: Hou Ruhua shiwen jidun* [The collections of Hau Yuhua's creative works]. Hong Kong: Infolink Publishing Ltd.
- Kwan, M.-N., & Ye, H. (Eds.). (2006). *Xianggang wenxue xinshi ziliao huibian* [The compilation of Hong Kong modern poetry]. Hong Kong: Fung Ngan

---

Publishing House.

- Liu, D.-H. (1999). *Xianggang wenxue shi* [The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Wu, X.-H. (2017). Meiyou ren zhidao ni xinzhong de daihai: Xiangzhengpai shiren Hou Ruhua shengping kao [A research of Hau Yuhua's life].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3, 97-105.
- Yip, C.-W. (2018). Zai liangdao jiafeng zhong zhanfang: Hongdou bianji geju tanxi [The editorial structure of Red Bean]. *Minguo Wenxue yu Wenhua Yanjiu Jikan*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Republic Period], 3, 61-93.